

中外名人傳

(十八)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四五頁）

李叔同 (一八八〇—一九四二)

自幼聰穎飽讀詩書

弘一法師李叔同，名文濤，又名漱筒，清光緒六年公元一八八〇年十月廿三日，生於天津河東區故居李宅。原籍浙江平湖。祖父寄籍塘沽，經營鹽業與銀錢等。父名世珍，字筱樓，清同治四年進士，官吏部主事。

叔同行三，係側室王氏所生。一八八四年，父病故，年七十二歲。他自幼天資聰穎，先隨母王氏背誦名詩格言，後從仲兄文熙受教啟蒙，飽讀詩書經文，力摹篆字，鑽研刻石。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與天津茶商俞家之女成婚。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剛滿十九歲的他因刻一印章：「南海康梁是吾師」，戊戌變法失敗便涉嫌是康梁餘黨，奉母偕妻南遷上海。不久，以「擬宋玉小言賦」等詩文詞賦接連在「城南文社」奪冠，兼之金石，書法俱佳，有「二十文章

驚海內」之譽。遂與滬上名士蔡小香、張小樓、袁希濂、許幻園結為「天涯五友」；曾以詩贈名妓「雁影女史」朱慧百。後又與著名畫家任伯年、高邕之、烏目山僧等組織上海書畫公會。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考入南洋公學經濟特科，師事蔡元培，同學有邵力子、黃炎培、謝無量、洪允祥等，皆一時之秀；時與上海名妓李萍香過往甚密。

東渡扶桑展露才華

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李叔同二十六歲時，因南洋公學發生罷課風潮，他與許多同學退學後，又與許幻園、黃炎培等創辦「滬學會」，提倡辦補習班，改良風俗，並為補習班撰寫「祖國歌」宣傳富國強兵，一時流行全國。是年四月，母病逝，扶柩回天津，易名李哀，秋，東渡扶桑，入東京上野美術學校留學，到日後即撰寫「國畫修得法」、「水彩書法說略」，刊載於留學生創編之「醒獅」月刊。第二年，在東京

獨立主編「音樂小雜誌」，於日本印刷，寄回國內發行；九月，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從畫家黑田清輝學習西洋畫。同年，加入同盟會。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春，他與同學曾孝谷一起組織話劇團體「春柳社」，研究新劇，是為中國話劇之始。除修習西洋畫，並在音樂學校學習鋼琴，又從川上音二郎和藤澤淺二郎研究西洋戲劇演技。春柳社為了賑濟徐淮地區災民，組織演出「茶花女」，他女扮男裝，飾演女主角瑪格麗特。「茶花女」演出的成功，使後來成為戲劇大師的歐陽予倩也加入了春柳社，成為李叔同的好友。接著，春柳社又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戲劇博物館內演出「黑奴籲天錄」，李叔同飾演愛美柳夫人，同時客串男角跛醉客，在東京引起了轟動。他開了中國人演出話劇的先河，算得上是話劇舞台的鼻祖之一。又填「喝火令」、「高陽台」等詞，並作「春風」、「昨夜」等詩，展露他多方面才華。

全力為國培養人才

留日期間，因與日本一位人體模特兒產生感情，結為夫妻。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學成回國後，先後執教於天津高等工業學堂，上海城東女校。不久，受聘為「太平洋報」主筆，主編文藝副刊，創作廣告畫、組織文美會，編輯「文美雜誌」，加入南社。民國元年七月，「太平洋報」停刊，遂奔赴杭州，在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任音樂美術教員，組織樂石社，編發「白陽」雜誌，其所作「春游」三部合唱曲，「西湖夜游記」、「歐洲文學之概觀」、「石膏模型用法」諸種作品，均署名「息霜」於此刊物發表。第二年，便加入西泠印社，與金石書畫大師吳昌碩往來密切。民國四年，應南京高等師範之聘，兼任該校國畫音樂教員，每月往來杭寧之間，十分辛勞。這時，他的大名已與「送別」、「悲秋」、「憶兒時」等歌曲揚名國內；他與經亨頤、夏丏尊諸同事一起，以其人格和學識，為國家培養了一批藝術界人才。其中像劉質平、豐子愷、潘天壽、吳夢非、曹聚仁、李鴻梁、黃寄慈等，後來都成為藝術界巨擘。有些人，即使在他出家當了和尚後，仍在藝術和人品上追隨著他。

皈依佛門弘揚律學

李叔同說過：「杭州這個地方，實堪為佛地……寺廟之多約有兩千餘所，可以想見杭州佛法之甚了。」他的心靈早被西湖的空山靈雨潤澤過了。民國五年夏天，夏丏尊在

一本日本雜誌上看到一篇「斷食修養方法」的文章，便介紹給李叔同看，想不到，當年寒假，李竟沒回滬與日本夫人團聚，卻跑到虎跑寺去實行斷食。斷食回來之後，居然喜歡起出家人的生活，從此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經了。好友們挽留，日本嬌妻的痛哭，都阻止不了他皈依佛門的決心。民國七年放暑假時，他把一切書籍、字畫、衣服等，分贈給師友、學生及校工，黯然離開杭州一師，走過西湖邊回廊，走向虎跑寺……半個月後，夏丏尊、豐子愷等人去看他時，他已經頭皮光光，著起海青，在晨鐘暮鼓中，成了弘一法師。他先研讀「華嚴經」，著「華嚴集聯三百」；後發願弘傳律學，專心鑽研已絕響八〇〇多年的南山律學，積二十餘年之功，潛心著述，完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篇」、「南山律苑文集」、「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扶桑集釋」等律學著作達四十四種之巨，並以其高蹈懿行和主持開辦南山律學院等弘揚律學，奠定了他作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的崇高地位。

棄絕享受茹素修行

作為律宗高僧的弘一法師，固然一生奉持的是律行，但他的佛學思想並不限於律學一途，而是多方面的，自成體系的，即他研究的是華嚴，修養弘傳的是律行，崇信的是淨土法門。他對寂山長老說：「弟子出家，

非謀衣食，純為了生死大事。」所以他棄絕人間一切享受，茹苦自勵地修行，勇猛精進鑽研佛經，用他自己的話說「空者是無我，不空者是救世之事業……」他不曾高豎法幡，廣收徒眾，亦顯大法師的威儀，不曾發起什麼佛教組織，也不曾擔任過什麼理事長、會長等要職，不曾出刊物做宣傳或弘法，不曾有黨國領袖、聞人大亨做他的徒弟、護法。他以此修得的佛理和不染人間煙塵，飽含人生哲理的書法作品，平和、堅實、認真、澈底地勸化眾生，起眾生之迷惘，警眾生之愚鈍，用佛學的宏大氣度和他的人格力量，以致於像魯迅、郁達夫、內山完造、郭沫若、徐悲鴻、馬一浮等名家都為之傾倒，一些高僧、居士弟子都為之折服，能拜訪一次，求得一字，聽其一課、見其一面，皆為幸事。民國十七年，他四十九歲時南下廈門，後十餘年便一直往來於江浙和福建之間，晚年常居泉州、廈門。

留下無數精神遺產

李叔同一生都是藝術的。他出家後，雖以華嚴為境，四分律為行，但對各種藝術都實踐過。他與太虛法師合作過「三寶歌」，創作了「清涼」、「山色」、「花香」、「世夢」、「觀心」、「知恩」等一批佛教歌詞，寫了一批詩文，著名的詩有「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得後人來。」文有「白馬湖放生記」等。為廈門第一

屈運動會創作了會歌，唱出「禾山蒼蒼，鶯水蕩蕩，國旗遍飄揚……請大家在領袖領導下把國事擔當。到那時，飲黃龍，為民族爭光。」抗戰吃緊時，他反複寫着：「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在給「南社」柳亞子的詩中寫道：「雲河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一九三九年，澳門「覺音月刊」、上海「佛學半月刊」分別為他出了專刊。徐悲鴻大師為他畫了油畫正面像。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他已覺著自己不久於人世了。在開元寺講「八大人覺經」、「淨土法要」……分別給夏丐尊、劉質平寫了訣別信，最後兩句是「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十月二日下午身體發熱，漸示微疾。十月十日下午寫「悲欣交集」四字交妙蓮法師，十三日晚八時安祥西逝，圓寂於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晚晴室，終年六十三歲。

一顆慧星殞落了，遺骨分葬於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

豐子愷為紀念他五十、六十至一百誕辰，分別為他畫出了五本「護生畫集」，在諸位教友和弟子的努力下，先後在海內外出版。杭州虎跑寺修建了他的紀念館，展示他生平事跡、宗教生活和宗教藝術成就，他的歌曲集、藝術集和人物傳不時在海內外出版、再版，大陸正在爭拍他的電視連續劇和電影藝術片，使他成爲近代海內外最爲傳奇的人物之一，爲人世間留下了無數精神「食糧」。

（余方德撰）

陳寶琛（一八四七—一九三五）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休息室裡懸掛著一副對聯，聯曰：「文明新舊能相益，心理東西本自同」。那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六月，陳寶琛八十四歲時爲哈佛燕京圖書館寫的。書法、對仗均工整，句子頗有深刻意致。陳寶琛，字毅菴，福建閩縣人。十八歲即爲舉人，二十一歲中清同治戊辰（一八六八）科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而官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此後，和光緒帝接近，並得慈禧太后寵眷，官至內閣學士，參與草擬詔書、敕令等機要之事。

陳寶琛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教溥儀讀書的時間最長，影響也最深。他對溥儀要求很嚴，每天除了讀經書念聖訓之外，還常給溥儀講歷代帝王爲政得失的故事，要他發奮有爲。陳寶琛常對溥儀說，立大功成大業者，必有一番自治之能力。尤其動靜起居食息諸事，皆有一定之時刻。如曾國藩在軍營裡，每日必有日記數則，讀書數篇。胡林翼則每日讀通鑒十篇，以爲課程，絲毫不苟其後二人果成戡定大亂之助臣。近時世界文明諸大國君，其於每日應於何時起身，何時運動、休息，皆有一定之安排，常久不變，故能使其國日臻強盛。溥儀對陳寶琛非常信任，事無巨細，都要請教這位穩健謹慎的師傅

。爲感謝他輔導有功，遜清皇室給陳寶琛以優厚的待遇，僅養廉銀一項，每月就有一千圓之多，折銀七百二十兩。溥儀的另二位老師朱益藩每月八百圓，而莊士敦才六百圓。

民國初年，詩壇上有「四陳」之稱，爲陳寶琛、陳的門生陳三立（散原老人）、陳三立的同年陳衍（即寫陳寶琛傳者）和陳曾壽。寶琛作詩清簡疏放，有魏晉人風，時有清氣拂其筆端，故出語皆脫越塵表。他曾對其學生黃懋謙說，初學詩於鄭孝胥的父親鄭守謙，後謝章铤又教他學唐代詩人岑參、高適詩，此外他也學過杜甫、黃庭堅等人的詩，頗入堂奧。汪辟疆稱陳詩「體雖出於臨川，實則兼有杜、韓、蘇、黃之勝，平生所作，思深味永，心平氣和，令人讀之，如飲醇醴，蓋修養之功既深，饜心之語斯赴，宗風大啟，重若斗山，非無故矣」。

中法戰爭時，由於陳寶琛和張佩綸力薦唐炯、徐延旭二人主持邊防關係，後因貽誤戰機，致使重要城市失陷，而相率敗潰，二人被定斬監候。而陳、張薦人失察，株連而受處分。陳由南洋大臣任降五級，而罷官家居。

歸里後，就任福州以課生童爲主的鰲峰書院山長之席，時年三十多歲，是歷屆山長中最年輕的，他在鰲峰有十六年之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清廷下令各省興辦學校，書院改爲學堂，其時福州的全閩大學堂和全閩師範學堂相繼成立，陳寶琛爲第一

屈師範學堂（即今之福建師範大學前身之一部分）監督，後又擔任達全閩大學堂（後改名福建高等學堂）監督。他為興辦教育嘔心瀝血，培養了不少人才。此外，他還總理福建鐵路事宜，並於一九一〇年，使福建第一條鐵路通車。

陳寶琛的復官，是在光緒、慈禧相繼死後，溥儀登極，大赦天下，並開復已革舊臣。時張之洞為體仁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位同首輔。他力薦陳寶琛，獲為總理禮學館大臣，不久又開復原官，並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一九一一年七月，他以侍郎後補，由隆裕皇太后派在毓慶宮授讀，開始作為宣統皇帝的師傅。辛亥革命前夕，陳寶琛以候補侍郎改補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和奕劻內閣的弼德院顧問大臣，授讀如故。

陳寶琛的女兒嫁與林則徐的曾孫林炳竟，林炳竟為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後回福州做起紳士。

陳寶琛為官清正，愛國廉明，是集史料於一身的歷史人物。後期纂修的《德宗本紀》（和《德宗實錄》），對後人研究清末歷史都是極重要的史料。晚年因患咳嗽而入北京德國醫院治療，然治療無效，卒年八十八歲，時為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沈津撰）

任覺五

（一九〇〇—一九九四）

重慶市教育長

四川省教育廳長

國民大會代表

任覺五，四川灌縣人，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生，一九九四年在美國舊金山逝世，無疾而終，享年九十五歲。

四川灌縣今改名為都江堰市，地處岷江上游，水急灘險。秦昭王時，蜀守李冰父子淘灘築堰，興水利，人民因此過了兩千多年的富裕生活。抗戰時四川足食足兵，支持擁護抗戰國策，獲得最後勝利，應是得力於李冰父子先導之功。

任覺五畢業於成都石室中學，石室中學舊址是漢景帝時文翁講學的地方。四川在古時是很難治的地方，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說法。然而到了文翁興學校以後，明經義教禮讓，蜀學興起，風氣大為轉變，於是漢武帝詔令郡國做蜀制度，遍立學校。然後經漢唐盛世，中國文化始得有強固的根基。任覺五生長在這裏，就學在這裏，得到山川靈秀的啟發，所以能不隨流俗，超群出眾，樹功名於世。

任氏中學畢業後，經三峽走出四川，大開眼界，他先到天津南開大學攻讀物理，後轉學到南京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讀到三年級時，國家多難，遭遇外侮，於是誓以身許國，投筆從戎，考入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於第四期畢業，與胡璉、羅列為同期同學，入伍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促進統一。北伐勝利後，奉蔣介石總

司令的命令到日本留學，三年後獲得日本明治大學政學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題目是：「生的宇宙論與民生歷史觀」。後來他更闡揚其意義，在南京軍校講「唯生論與民生史觀」。先是陳立夫曾在中央政治學校講「唯生論」，他們兩位所談的理論異曲同工，結論相似只是引證不同。

任覺五一生從事於教育與訓練工作，效命黨國，屢當重任。他早年從軍，以後就負責主持組訓青年的工作，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組織處副處長、三青团成渝支團主任。大陸變色前在重慶市教育局長、四川省教育廳長任內，整頓後方教育，撫輯流亡學生，策劃全國大中學校第二次遷川的準備工作，並擬重披戰袍到川康邊區打游擊。最後在成都陷落前夕，奉命飛台灣參加建設工作。

他對國家的最大貢獻，應是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分院任內，擔任主任十八年，造就了萬千台灣建設幹部、婦女工作幹部、海外僑務幹部，因此也造就了建設台灣的奇蹟。至於他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評議委員、國大代表、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參議國政，領導群倫，也有不少翊贊的功勞。

他本習科學，實事求是，崇尚儉樸。幼年時母親教訓：「坐時不要東偏西倒，走路不要東張西望」，奉為一生行為的規範，並用來教人。他為人誠懇，很守信用，寬恕待

人，不與人爭，重道義而不役於物，矜名節而不與世浮沉。

他九十二歲高齡時，還向台灣執政者進言說：「要用真才，盡誠心，實行民主、法治；發展文經事業，使國家能夠達到真正的統一與均富。自立自強，建設富強康樂的新中國。」

歷年來寫了七部有名著作，簡單的說：第一部為哲學思想，第二部為生的宇宙論與民生史觀，第三部至第七部談行為之準則，包括了生活規範、律己之道、交友待人之道、修養之道。各書在台灣共發行了十七版，最後於一九九二年由他的朋友在台灣匯編成三巨冊問世，取名為「立達文稿」。就是取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意思。

任覺五的學術理論是以「唯生論與民生史觀」作為哲學基礎，而歸之於忠、恕、仁三者。他認為我國志士盡忠有餘而寬恕不足，似乎應該多行恕道。先哲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西方哲學家說的所謂「金律」，有同樣意義，可以作為國人的借鑑。

他的夫人龔慧女士，出自貴州名門，喜好國劇，早他四年在台灣逝世，得年七十九歲。在成都危急時，龔慧女士倉卒間揮淚離夫，獨自攜帶幼弱子女四人，奔走海南，望門投宿，不憂不懼，真是智能膽識過人，令人欽佩。

他們現存的子女有八人，兩男名代光、代天。六個女兒名旭君、俞蓉、旭萍、旭真、旭文、旭江。都進入中美學府，得有學位，習有專長，服務社會人群，受人愛重。（蕭新民撰）

何聯奎（一九〇二—一九七七）

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

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國民大會代表

何聯奎，字子星，浙江松陽人。一九〇

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民國紀元前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父親何文龍，篤義理之學，教導子弟對聯奎治學為人，影響啟迪甚多。年十三，入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學，與陳誠同學，交情深厚。畢業後，初升上海復旦公學，繼轉浙江省立法政專門學校。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秋，北上入北京大學預科；嗣進本科英國文學系，兼選修其他文史課程，因得受業於單不庵、林損、黃節、胡適、王國維、陳大齊諸教授。民國十二年，開始從事學術活動，與學友游國恩、曲殿元共同創國學月報。其後因受孫文學說啟發，乃毅然加入中國國民黨為黨員，以期為國盡力。民國十五年，畢業北京大學，翌年春南下，參加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政治部工作；旋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秘書等職。十七年

春赴法，入巴黎大學從民族學大師布格萊（C. Baudouin）及傅谷納（P. Faconnet）遊。兩年後，又赴倫敦與社會學大家金斯勃格（M. Ginsberg）、文化人類學宗師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研究，潛心學習受教，獲益良多。

民國二十年夏天自歐洲學成回國，執教北平大學。九一八事變後一年，國聯調查報告發表後，曾為文痛斥日本侵略。嗣因病返回故鄉，病癒後從事奮民調查工作；知有圖騰遺族存在，特就研究所得，撰成「奮民問題」與「奮民在民族學上之新發見」二文，北大蔡元培校長見之，勗勉有加。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度，應聘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講民族學。二十三年秋與黃文山、孫本文、凌純聲、高承祖、徐益棠、衛惠林諸教授在南京組設「中國民族學會」，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教授亦欣然參加民族學會。

民國二十三年冬，江西剿共軍事勝利，國民政府為國防需要，於二十四年三月，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特設陸軍整理處，由何氏中學同學陳誠任處長，何氏被召任同少將主任秘書。六月，參加籌辦峨眉軍官訓練團。二十五年一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轅秘書。九月，國府為解決兩廣問題，設廣州軍委會委員長行營，何氏任行營參議。二十六年五月，參加籌辦廬山訓練團，連辦二期，曾纂「廬山暑期訓練實紀」。二

十七年二月，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會委員兼秘書。先後引薦同事衛惠林、吳克剛等為設計委員。四月，奉命籌備中央訓練委員會，五月成立，任指導處長。二十八年四月，中央訓練委員會改組，受任訓練會委員兼秘書主任；六月，兼掃蕩報總社社長。

九月，又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幹事。

民國二十九年，被選為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三十一年，被選為第三屆國民參政員。對抗戰建國大計提供建言。三十三年任中央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前後服務訓練委員會，歷時八載，使調訓各級幹部，分布全國各地，力行國策，擁護政府，支持長期抗戰；發揮訓練功能，厥功甚偉。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日戰爭結束，榮受政府頒發勝利勳章。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受國立中央大學之聘，任專任教授兼法學院院長。九月，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政治委員會委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一九四八年三月出席行憲第一次國大會議，選舉總統副總統。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以中大法學院播遷來臺計劃未及實現，受陳誠主席之聘擔任文化工作。三月及八月，曾兩次去廣州出席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並糾合同志黃文山、黃仁俊、周錦朝、劉伯驥等，籌謀海外反

共組織之推展；又以周錦朝從事國民外交，奔走臺北、華盛頓之間，斡旋兩年，周錦朝函件悉由何氏親為承轉，聯絡行政院陳誠院長並協助辦理國民外交，盡力甚多。

民國四十年至四十三年任行政院副秘書長。其間應聘臺大任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政院改組後，被聘為顧問。四十九年及五十一年兩次赴巴黎參加聯合國文教組織大會。自五十三年起，受聘任國立故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副主任委員及主任委員並兼理事會理事等職。

國立故宮博物院在臺恢復設置，何氏受任副院長，前後十有餘年，對中國古代文物之保管考訂宣揚，均竭盡心力。

何氏為人，天性純樸，宅心仁厚；愛人如己，為國忘家，久服公職，勤慎忠誠，然從政不忘治學，頗多心得。早年撰中國民族文化稿，近百萬言，惜未攜出，橫遭劫佚。民國三十八年，在臺調查山地文化，申論臺灣亦有圖騰遺跡之存在，而於世界圖騰文化之分布又獲一實證；因而確有創獲。此外，研究殷商器物饗餐紋文，斷定其為羌人犧牲之者，即為一種圖騰之象徵；又研究故宮所藏青銅禮器，亦有新理解與新證明。

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廿四日上午均在故宮博物院辦公，傍晚歸家，至午夜十二時突發心臟病，送醫不治，享年七十六歲。遺著有：民族文化研究、中國禮俗研究、臺灣風土志、臺灣省志禮俗篇、蔡元培民族學論著

、何聯奎文集等書。（王培堯撰）

黃仲翔 (一九〇一—一九九五)

黃仲翔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國十一年（一九〇一年）二月五日生，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病逝於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寓所，享年九十五歲。

黃仲翔的先祖由江西到四川，世居成都附近，以耕讀傳家，到他祖父時開始兼營紡織，遠近聞名的蜀錦，就是他們的產品。他父親到日本研習法律，回國後執業律師，開民國初年我國律師業務的先河。

黃氏幼年時聰明好學，六歲入私塾啟蒙，民國初年實施新學制，於是改進新制小學、中學、師範等學校，再到四川省立茶務所研習。由於他獲取新知欲望很高，四川省政府特派黃氏到江蘇、浙江、安徽等省考察實業，當時正逢梁啟超、江亢虎、胡適之等提倡新學，受到新思想的影響，黃氏特為到南京東南大學去旁聽，一年後轉往南通農科大學深造。在那個時候，革命風潮非常熱烈，孫中山又在廣州創立黃埔軍校，觀察時局，令人憂慮，如不獻身革命，實難以挽救國家的危局，黃氏經先烈孔庚函薦，一九二四年考入了黃埔軍校第三期，從此決心追隨蔣介石校長安內攘外。

一九二五年先後參加清剿叛逆，消滅了楊希閔、劉震寰平定廣州；同年冬季陳炯明

殘部盤據東江，重起叛亂，黃氏以國民黨連黨代表兼先鋒敢死隊長身分，率同學八十人，組隊仰攻惠州。

這一仗是自願參加，黃氏率先報名，經蔣介石校長親臨前線，選中九人組隊，各人都先寫好遺書，表示慷慨就義的決心。惠州城居高臨下，且三面環水，攻擊很難，在激戰中黃仲翔被敵人射穿胸部，血流如注，但仍不顧傷痛，扶創奮進，乘勝追擊，於是攻下了惠州，奠定了北伐勝利基礎。這就是近代革命史上有名的東征戰役，也就是惠州戰役。他的傷勢幸無生命危險，經三個月的療養後痊癒。

傷癒後奉派為國民革命軍代表辦公廳幹事、師政治部科長、秘書等職。

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夕，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成立軍人部，由蔣介石總司令兼任部長，調他擔任組織主任，軍人黨務及其主要人事的任免考核，都歸黃氏負責。他之所以承擔重任，是由於為人善識大體，且治事周詳穩練，很得人緣，不論識與不識，對他都很敬重。

他又當選為南京特別市黨部歷屆常務委員十多年，同時又兼任中央軍隊黨務工作人員訓練班副主任。「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日急，國事日危，全國人民必須接受軍事訓練以應時變，那時中央黨部有男女同志兩千多人，首先實施軍事訓練，黃氏奉派擔任總隊長職務。

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定都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縮減編制，將軍人部併入組織部，改設軍人科，中央派黃氏任科長，此後有關軍中黨務重要事項，均由他逐一呈報請示，在這一時期，他常和蔣介石總司令見面，或一同進餐，受益甚多。

黃埔創校初期，共產黨員進入學校的很多，他們組織了軍人聯合會，暗地發展勢力，黃仲翔則另組孫文學會對抗，所以共黨人士對他十分怨恨，後來國民黨鬧寧漢分裂，他奉命前往救平，被共黨人士知道，乘他在血花劇社集會時圍捕，被捕的有七人，他在押解途中藉機脫走，其餘的六人則遭受酷刑，被凌辱至死。

一九三五年冬，在南京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他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當時全國統一不久，亟盼安定民心，各區人選，希望能平均分配，以鞏固團結力量，但是選舉結果，顯示邊遠地區名額過少，蔣介石頗為憂慮，黃仲翔了解這一情況後，即向大會書面請辭，並推薦邊疆同志遞補，這種無私無我的胸懷，實在令人感佩！大會閉幕之後，蔣介石特以手函嘉勉，這項手稿黃仲翔珍藏了四十多年，以示不忘領袖、校長的德意，到一九八五年二月，他將這份文件，送交給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館收藏。

一九四七年五月，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陪都重慶召開，選舉委員前夕，蔣介石委員長特別在會中宣揚黃仲翔謙辭的美德，於

是以最高票當選為中央委員。

黃仲翔先後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五屆、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抗戰初期調任軍事委員會第六部少將處長及青年戰地服務團團長，奉命收容東北撤退及留日回國學生，經常往來戰區，與團員仍共嘗甘苦。

一九三九年調任四川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並兼青年團四川團支部常務監察，同事們受他的精神感召，氣象一新。

一九四〇年轉任四川省政府社會處處長，任期長達十年，由於這是政府組織的創新，他盡心竭力，規劃各項社會福利，推廣救濟措施，倡導社會運動，在當時都是新猷，沒有前例可循，他對於我國社會福利運動的開展和貢獻，實在很大。

實行憲政以後，當選為第一屆成都縣國民大會代表，一九四九年政府播遷來台以後，黃氏在國大議壇時時有匡時大計的宏論，高瞻遠矚的見解，令人欽佩！

黃仲翔的夫人胡元度，四川資中人，溫柔賢淑，持家有道，精書畫詩文，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於一九八五年在美國科州逝世，育有子女八人，均寓居科州丹佛市，都已成家立業。黃仲翔晚年赴美與子女團聚，子女們亦能克盡孝思。平日身體尚健，因年逾九十，心臟功能漸衰，出入醫院次數增多，不幸於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病逝寓所，五月六日與夫人合葬於丹佛市皇冠山墓園。（汪清澄撰）

徐志道 (一九〇二—一九八四)

軍統局別働軍司令

交警總局副局長

國防部保密局局長

國民大會代表

徐志道字致陶江蘇省海門縣人，生於一

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世代耕讀

傳家，黃埔軍校三期畢業後又在陸軍大學

將官班甲級三期畢業。歷任連營團長、處長

、參謀長、指揮官、別働軍司令、交通警察

總局副局長、國防部保密局長等職，任官陸

軍中將，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膺選國民

大會代表。一九三一年徐氏任憲兵特務營長

後不久，日軍侵華，上海淞滬大戰爆發，一

九三二年二月一日深夜，南京浦口日軍兵艦

的艦砲，轟擊下關，居民驚惶逃難，徐氏奉

命馳往警備，幸得保衛下關安全。適逢國軍

自浦口渡江增援上海，日艦又圖藉口挑釁，

聲言「如不停止運兵過江，立即發砲轟擊，

陸戰隊登陸，佔據下關」，首都警備司令兼

憲兵司令谷正倫，鑑於情勢嚴重，星夜令徐

志道往訪日本領事上村木四郎商談，詎晤面

尚未交談，上村即以美鈔一疊賄賂，意圖利

用，徐志道嚴詞固拒，不為所惑，繼即說明

國軍係定期調防，請其立即轉告日本海軍勿

滋誤會，並說明中日俄間之矛盾利害關係，

免為俄國所利用，上村頻頻頷首，允即轉知

艦隊司令，終於化險為夷。到了四月，在國聯調查團離京轉赴東北調查「九一八」事件後，日本駐南京領事館職員藏本突告失蹤，日方誣指被中國秀民劫持，要求國民政府負責交還，否則一切後果，概由中國國民政府負責。此顯又陰謀仿效瀋陽中村失蹤模式，製造第二個「九一八」，藉口出兵進佔南京，一時風聲鶴唳，徐氏奉命負責率兵偵搜，經五日夜之部署搜尋，終在孝陵衛山坡小廟中尋獲，送還日方，於是擾攘之南京局勢，得以恢復安定。徐氏在下關擔任警備期間，雖日夜操勞，猶仍念念於憲兵任務重大，當時憲兵之素質、訓練、教育、編組等工作，均須有以改進，方能擔負軍事警察使命。於是研擬憲兵改造方案，呈經谷正倫司令報奉蔣介石委員長核准實施，因又先後受命創辦憲兵教導總隊暨憲兵訓練所，建立了往後憲兵建軍基礎。一九三六年三月，谷正倫司令命徐志道接任總務處長，秋天奉派赴日考察憲警，回國後著有「憲警常識」一書，供作憲兵教材。

一九三七年一月，赴成都接任憲兵第五團團長，由於四川主席劉湘排拒中央軍駐川，徐氏，乃時常周旋於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諸將領間，建立關係，川軍在抗戰期間未致攜貳，斯亦不無影響。一九三八年六月，應邀參加由戴笠領導之特戰工作，一九三九年開始，指揮敵後抗日游擊，數瀕於危。一九四四年升任別働軍中將司令，繼續予日敵軍隊打擊，直到抗戰勝利。一九四九年春，共軍席捲大陸大半河山，總統蔣介石任命徐氏接任國防部保密局長，固辭未准，匆促飛廣州，思挽危局，十月間廣州不守，徐氏至香港，一九五〇年一月輾轉抵臺北，五月調國防部中將參議，一度應參謀次長鄭介民將軍之邀，協理業務。一九五二年七月自請退役，專任國大代表，參加憲政研討工作，殫精竭慮，屢提重要方案供政府參採。

徐氏一生忠愛國家，廉正樸實，誠懇待人，淡泊知命，向無痼疾，八十歲以後目力漸衰，體能轉弱。一九八四年元月六日傍晚小眠，七時許呼吸窒息，導致昏迷，旋送臺北市臺灣療養院急救，延至七日清晨二時二十分，因急性心肌梗塞，乏術回天，夫人陳氏及子徐國屏、徐國藩、徐同慶、徐堯慶隨侍在側，享壽八十三歲。著有「七十雜憶」長文，刊於中外雜誌。（龔祖遂撰）

譚雲山 (一八九〇—一九八三)

印度中印文化學會創辦人

印度中國學院院長兼漢學教授

印度世界佛學院創辦人

譚雲山，湖南長沙人，一八九〇年出生

，著有《中國佛教近代史》的東初法師，一

九七一年至印度巡禮聖跡時，曾與雲山相見

，稱贊譚氏：「現已年逾八旬，仍在努力促

進中印文化交流。……」以此推算，雲山約

出生於清季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至二十年之間——亦即一八九〇年至九五年間。

譚雲山是長沙譚姓望族一分子，青年時期攻讀教育，性喜經史釋典，工詩文、善書法，長於寫作。二十五歲以前，曾在緬甸仰光的一家華文報紙任主筆。繼赴星洲，在新加坡某中學任教，一九二七年，印度文學家大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遊歷星洲，譚氏此時和泰戈爾初次見面。泰戈爾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早在一九二四年，曾應北京文化界名流梁啟超、胡適、徐志摩等邀請來中國講學，受到學術界熱烈的歡迎，譚氏曾熟讀過漢譯的泰戈爾作品，對此一偉大詩哲十分敬仰，泰戈爾在華活動的報導及演講辭，譚氏都仔細閱讀，初次見面，有若素識。譚氏說他是學佛的人，熱愛印度文化，願為中印文化交流而努力。泰戈爾對這位中國青年十分欣賞，不以年齡的差距，建立了以後十五年的友誼。

一九二八年，雲山自新加坡首次赴印度，到聖地尼可坦(Santiniketa)的國際大學，面謁泰戈爾，留在國際大學學習語文，研究印度哲學及文學，並開設中文班，以教授印度學者。假期中，他朝禮佛教聖蹟，撰著《印度周遊記》一書，記述旅遊所見。

早年留學印度，依雲山受學多年的國際名學者巴宙教授，曾撰有《譚雲山與現代中印文化關係》，記述雲山對中印文化的貢獻，是第一手珍貴資料，文中述及雲山與甘地

見面的經過說：「事因一九三〇年，他忽有特別公務往西藏的拉薩晉謁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當時之西藏活佛曾詳詢甘地先生及其他領袖之近況，於其離藏返印時，托其攜函一件轉達甘地，因此他必須前往拜訪此位「大靈魂」(Mahatma)。」

譚氏究以何種公務前往拉薩，經多方面探索資料，查得其詳情：事緣一九三〇年，西藏達賴喇嘛與南京國民政府有隙，國民政府派謝國樑以專使身分，赴西藏安撫。當時由四川入藏的道路，以軍事問題險阻難行，謝國樑乃由印度取道入藏。在印度時，透過大使館關係，聘譚雲山以隨員身分偕行。時為一九三〇年冬季，途中越世界最高峰喜馬拉雅山，溫度恆在零下數十度，隨行騾馬時有凍斃，謝國樑時已年邁，不耐關山險阻與氣候酷寒，竟於途中病逝。譚氏為謝國樑營身後事，事竟，仍免力前進，歷時二十餘日，抵達拉薩，謁見達賴喇嘛，代表謝國樑宣達中央德意，達賴喇嘛亦表達了擁護中央的意願，譚氏留拉薩兩月，事畢返回時，行前達賴喇嘛以藏文寫就的書信一封，託他面致甘地，譚氏仍循原路返回印度。

譚氏以攜有達賴喇嘛的書信，必須面謁甘地，最初約定地點在德里，他趕至德里時，甘地已返往其地沙巴摩提，再至沙巴摩提，甘地又到了巴多利城，迨至巴多利，才和甘地見了面，時為一九三一年四月底。譚氏呈上達賴喇嘛信件，約請甘地赴中國參觀。

甘地答：「若印度未能獲得自由時，我是不會離開印度的。」離開巴多利時，請甘地給中國青年一些簡短的忠告。甘地書一短簡，意譯為：「親愛的朋友們，你必須再來看我，時間可隨你的便。我對中國青年的忠言，是中國之拯救，是用純白無疵的和平與愛，不宜硬用威權，徒傷生命。」完成此一任務後，他取道海路返國，到南京向國民政府報告了訪問西藏的經過，並轉達了達賴喇嘛擁護中央的願望。他並在海潮音月刊撰文說明：「達賴赤誠擁護中央，只要中央不反對西藏佛教，予達賴以佛教最高領袖地位，中央可立即派員前往成立西藏黨部，組織地方政府，或承認他們現有的政府，由中國顧問指導，達賴必定竭誠歡迎，毫無阻礙的情形。」由於譚氏的努力溝通，後來國民政府設置了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以改善中央與西藏關係。

譚氏離印回國時，泰戈爾曾和他深談，二人談到中印文化交流、中印學者交換，有必要在國際大學成立一永久性的漢學研究機構。否則一切交流活動，無非是曇花一現。譚氏回國後，奔走於京滬之間，向政府有關部門，文化教育界宣揚此一構想，請予贊助。此計劃得到黨國要人戴傳賢、陳立夫、朱家華、張道藩，及佛教人士太虛法師、王一亭、黃警頑、黃涵之等的贊同，決定先成立「中印文化學會」，中印學會於一九三三年在南京成立，入會者皆社會名流。學會的宗

旨，在於提醒國人重視中印精神文明，以和平、博愛、自由、平等的崇高理想，復興中印文化交流，加強中印民族間的傳統友誼。

一九三三年夏，甘地為印度解放運動絕食三星期。這種偉大舉動，引起世界人士的重視與同情。譚氏素來同情印度的解放運動，又與他與甘地有交誼，他在南京，宣布與甘地同時絕食，以表同情與支持，事為報紙刊載，印人聞之極為感動。印度與都佛陀社的嘛多普拉沙得喀那氏，特致函譚雲山道謝及慰問，原函大意謂：

「敬愛的先生：吾人由報紙上得聞先生開始絕食，不勝感痛，此種苦行舉動，雖極難能可貴，但在佛教則不甚讚許，我主釋迦牟尼佛在未成道前亦有此舉，但終至廢棄。及成道之後，乃切戒其徒，毋為此舉。此當為先生所熟知也。先生之生命。對於貴國比對於印度更為重要。謹以至誠，向先生勸慰。願先生接受吾人之請求，立即捨棄此種舉動，並願我主助汝健康。汝誠實之嘛多普拉沙得喀那氏。」

一九三四年，譚氏由中國返回印度，以國際大學為根據地，組織印度「中印文化學會」，入會者皆印度文化教育界人士及參與印度獨立運動的重要人物。繼而進一步又推動在國際大學內成立「中國學院」的建院工作。經過數年的努力，在中印人士的支持下，中驛國學院於一九三七年建築完成，隆重的舉行了落成典禮，典禮之日，甘地曾馳書

致賀，政治領袖尼赫魯，特遣其女公子攜帶著他的賀詞參加盛典。中國學院成立，譚氏擔任院長兼漢學教授，除授課及處理學院事務外，經常受各地學術機關及社會團體之請，前往作中國文化方面的演講，把中國儒家文化的倫理道德、四維八德等，與佛教的慈悲智慧、五戒十善等結合起來，向聽眾作明晰的講述，以證明中印的精神文明實相符合，呼籲中印兩國人民攜手合作，為世界和平而努力。譚氏透過國內中印學會的溝通，請國民政府教育有關部門，捐贈大批國學圖書及十部頻伽大藏經，分贈給國際大學、印度大學、加爾各答大學、安達拉大學及大菩提學會、孟加拉佛教會等機構。

此外，譚氏推動中印兩國的學者交換及文化交流。請國民政府教育部設立獎學金，鼓勵印度學者到中國研究漢學；同時派遣留學生到印度留學，印度到華研究的有師覺月、蒲羅丹、巴帕提等。由中國派赴印度的，有沈琦、王漢中、魏桂蓀等。一九四〇年，太虛大師率團訪問印度、錫蘭及東南亞佛教國家，回國後商得教育部同意，派遣法舫、白慧、達居三人赴印留學。後來達居留在緬甸學習巴利文，法舫和白慧到了印度，進入國際大學攻讀。不屬於兩國公費派遣，自費入國際大學或中國學院研究攻讀者，尚有巴宙、周祥光、冉雲華、周達夫、蕭化民、余清坡等近三十人之多。譽滿國際的大畫家徐悲鴻，曾在國際大學作過一年多的研究。這

些人，在校期間，學業上或生活上，都受過譚雲山的指導或照顧。至於國內佛教界學術界人士到了印度，也多受到他的接待。

譚雲山與大詩人泰戈爾的關係，亦師亦友，他們時時晤談，維持了十五年的交誼。一九四二年四月，泰戈爾在加爾各答病重，譚氏立即趕去探視。泰戈爾病逝，譚氏曾撰文表達他的敬仰與追念。

譚雲山在國際大學，任中國學院院長三十五年，為中印文化交流盡了最大的努力，一九七一年，年逾八十，他將中國學院院務交與同事接替，自己則到佛陀成道處的菩提伽耶，另行創建「世界佛學苑」，經過他的努力，苑舍完成大半，譚氏於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病逝，享年約八十四歲。譚氏精通梵文，在佛教中以研究印度哲學馳名，惜未見有著作傳世。（于凌波撰）

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

英國前首相艾登 (Anthony Eden) 於第二次大戰後曾繼邱吉爾領導保守黨出任英國首相，為戰後著名的國際政治人物，他更能於一九五七年辭卸首相一職後，放下身段，像小市民一樣擠乘倫敦公共汽車，是最平民化的「大人物」，其民主風範，一直為人津津樂道。艾登於一八九七年生於杜翰姆 (Dunham)，青年時代從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隨軍在法國前線作戰，服役兩年，身先

士卒，戰功輝煌。一次大戰結束後進入牛津大學研讀法律，一九二二年畢業，次年以二十六歲的年齡競選下議院議員，一舉成功，進入國會，成爲最年輕的國會議員。以後連選連任，直到一九三五年，由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選選爲英國外相，

一九三八年第二次大戰前夕，張伯倫向德國的納粹頭子希特勒和意大利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妥協，艾登不滿，憤而辭職。一九四〇年邱吉爾繼任首相，英國已捲入歐洲戰場，艾登復出政壇，身負艱鉅重任外相，折衝於東西方，爲對抗納粹而努力，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才卸任。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年又任外相，一九五四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授給他騎士爵銜，一九六一年又被封爲亞朗子爵，成了貴族。

艾登於一九五五年出任首相，任內最重要的決定，是和法國的戴高樂聯合組織聯軍，於一九五六年十月佔領蘇彝士運河，保持這條國際水道繼續對西方開放。在英法聯軍出據以前，埃及總統納塞宣佈退回蘇彝士運河區，船隻通行權由埃及決定，由於納塞親近蘇聯集團，有不利西方通行之意，英法乃聯合採取軍事行動。

早在一八八一年的一項國際會議中，即已獲協議，蘇彝士運河水道對所有國家的船隻開放，自由通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開進運河區強行佔領。二次大戰時，所有軸心國船隻都被禁止通行。一九四八年，以色

列和阿拉伯國家間第一次開戰，埃及禁阻以色列船隻通過運河，挑起戰火，以阿之間引起衝突，直到一九五〇年才結束。

一九五四年英國和埃及達成協議，英軍撤離運河區，同時提供經援，供埃及興建阿斯萬水壩，這一水壩橫越尼羅河下游，是埃及極爲重要的水利工程。此一結果導致埃及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高唱「埃及人的埃及」，雄心萬丈的納塞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強行接管蘇彝士運河，此舉引起英法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強烈反對，一致對納塞強力施壓。以色列更藉機挑釁，於是年十月廿九日揮軍進攻埃及，英法聯軍亦於十月卅一日揮軍奪取運河區，恢復這條國際水道暢通。十一月六日聯合國出面協商，結束戰爭，保證運河水道自由通行。這次行動，英國首相艾登，爲極重要的決策人物。不過此一水道於一九六七年以阿六日戰爭時，被埃及以沉船阻斷，直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始恢復通航。

艾登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因健康不佳而辭職，往後即養病於倫敦，不問政事，而於一九七七年病逝。（吳融樂撰）

顧儉德（一九三二—一九九五）

台灣省物資局長

經濟部顧問

顧儉德江蘇太倉縣人，生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畢業

於上海交通大學工學院土木工程系。畢業後赴美留學，就讀於美國密其根大學，獲得工程碩士學位。

一九三七年留美學成返國後，正值抗戰軍興，顧氏就任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北辦事處技佐，後又改任南京市政建設委員會工程師兼下水道工務所副主任工程師，對於南京市下水道設計與規劃，甚爲詳盡。南京撤退後，顧氏轉任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正工程師，戰爭迫近西南，又轉任雲南經濟委員會曲靖辦事處主任。

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顧氏出任善後救濟總署浙閩分署專門委員，辦理浙江與福建兩省善後救濟事宜。

台灣光復後，上海交大一九三四級土木工程系同學多人隨台灣行政長官官署（後改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包廳長可永來台，費驊出任建設廳公共工程局局長，顧儉德任副局長，其後費驊調台灣鐵路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由交通處處長陳清文兼任），顧氏升任局長，顧儉德交大同級同學劉永楸、張金銘任副局長，鐵路局主任秘書宋家治，會計處長高振華等，均爲交大同級同學，對於台灣省公共工程規劃建設，甚爲週詳，供獻甚大。同時，顧儉德並兼任建設廳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五二年民國四十一年春，同級同學張仁滔（原任建設廳副廳長）籌組成立台灣省物資局，擔任局長，邀請顧儉德任副局長。物資局任務爲審貸民營企業

生產資金，統籌重要原料輸入，協助成品內銷與外銷，並著重勞務輸出，爭取外匯，輔助省內民營工業的建立與發展，特別重視中小企業方面，予以指導與協助。又逐漸建立了全面供應網，擴大供配範圍，調節市場需要，以減輕軍公教人員與漁民山胞等的生活負擔，成績極為卓著。張仁滔後來調到中國國民黨事業單位服務，物資局局長即由顧儉德升任，駕輕就熟，繼續努力發展，成績斐然。後來顧儉德因應前台灣銀行副總經理應昌期之約，離開公職，助應發展民營高級紡織工業，獨樹一幟，成就甚大。

趙耀東任經濟部長時，曾在民間工商業中，選擇專家十餘人，聘為經濟部顧問（不支薪），徵求專家意見，幫助趙耀東發展我國工業與經濟。顧儉德即為其中之一，專負責提供高級紡織工業發展的政策與意見，供趙耀東部長作施政的參考。

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十月，作者自美返國，十一月四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前，到新生南路三段九十號懷恩堂浸信會去參加禮拜。在教堂門口遇見交大（一九三四）級同學劉永楸在發節目單。劉永楸告訴我顧儉德業已逝世，定（十一月十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將為顧儉德做「追思禮拜」，由周聯華牧師主持，盼我能參加。

我與顧儉德同年畢業，他是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我是北平交大鐵道管理系，所學與工作努力方向雖不相同，但同學間的友誼

非常情厚，相知亦深。所以，屆期，我去參加「追思禮拜」。才曉得顧儉德的夫人已在一九九四年去世，對他的打擊甚大，他一年以來，落落寡歡，雖赴美探視兒女，但心境索然，致不到一年，竟相隨而去，伉儷情深，有以致之。享年八十四歲。

參加禮拜者，有同學王敏慶（高二屆），同級同學宋雲治、唐民、劉永楸及夫人、徐人壽（已故）夫人、袁祥（已故）夫人、費驊（已故）子女等多人。（陳樹曦撰）

唐舜君（一九一五—一九九六）

國大之花亭譽南京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唐舜君早年在首都南京出席行憲會議時有「國大之花」的美譽，那時她才卅出頭，綠鬢紅顏，風華正茂，出席國大會議，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是記者下筆的好材料，所以唐舜君的芳名早在一九四八年即名聞全國，成為「美」的代言人。歲月如流，匆匆五十年，一代美女唐舜君竟在寶島台灣老成凋謝！

唐舜君是滿族貴胄，依照清朝的習慣，應該稱她為「格格」（公主），光緒帝的兩個妃子瑾妃及珍妃姊妹倆，是她的嫡親姑母，珍妃和光緒帝情深意重，史有記載，最後雖悲劇收場，但珍妃和光緒的愛情故事，仍是千古絕唱。唐舜君有這樣的姑母，她的家

世自然亦非平常，當然是顯宦世家，簪纓門第，才有資格和皇帝締婚。原來她的高祖父裕泰，曾任湖廣陝甘總督，以軍功封太子太保，賞戴雙眼花翎，卒諡莊毅，這樣的封疆大吏，在滿族中也少有人能及。祖父長敘，做過兵部侍郎（相當於國防部長），三伯祖長敬，做過廣州將軍，父親志錡曾任八旗軍正藍旗滿洲督統，是一品大員，所以她的長輩歷任都是武將，功在清廷。

然而唐舜君本人卻是個文藝氣息極重的現代女性，她生於一九一五年農曆十月廿五日，故里是北平，當時已是民國時代，清朝覆亡，但滿清的遺老大臣，宦囊已豐，生活過得仍很優裕，故而唐舜君自幼即受良好教育，跟男孩一樣曾熟讀經史，滿腹詩書，稍長習丹青，學書法，從名師學習山水、翎毛花卉，到了少女時期，下筆為文，字字珠玉，而繪畫則是墨潤筆秀，意韻高遠。加之她容貌美麗，舉止嫺雅，在故都有才女之稱，名聞遐邇。

湘籍才子屏雀中選

一九三六年唐舜君在北平邂逅湖南才子雷嗣尚，雷氏俊雅挺拔，雄姿英發。當時年方卅，已是北平特別市政府的社會局長，前途無可限量，兩人相見恨晚，遂結連理，那時唐舜君才青春二十二歲。

次年，長子雷道餘誕生，不久，盧溝橋事變發生，遍地抗戰烽火，北平危殆。唐舜

君隨夫南遷，經蘇浙輾轉而至湖南，在湖南生次子雷孝琛，戰火已蔓延至華中，又攜子西遷重慶。當時雷嗣尚忙於抗日救國，在軍中擔任文化宣傳工作，主持黨營的青年書店，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顧問，忙碌異常，無暇家顧，全賴唐舜君悉力維持。

抗敵救國夫婦早逝

不久，雷嗣尚隻身潛返湖南，在衡陽創設南華實業公司，希望藉此廣集戰略物資，支援抗戰。稍具規模後，唐舜君亦由四川返湘，協助丈夫經營。他們在衡陽設有酒精廠，木材廠及農場，開展甚速，對支援抗戰物資多所匡助，可惜到了一九四四年，日寇侵襲湘南，與國軍在衡陽展開大會戰，一場血戰過後，雷嗣尚的公司被夷為平地，多年心血付諸流水，使他極為痛心。

此時雷嗣尚深知經商抗敵，不切實際，乃把妻兒安頓後，自組湘南遊擊武力，自任湘南自衛區司令，親自投身抗敵。由於是當地人，佔天地之便，他結合民衆，神出鬼沒，予日寇重創。不久，雷嗣尚奉中央命令兼任藍山縣縣長，更日夜策劃殲敵，不眠不休，終因體力支持過劇病倒，經運送故鄉嘉禾縣療養，但在窮鄉僻壤，既乏藥物又無良醫，病勢日重，唐舜君衣不解帶，自任護理，服侍數月又聯絡在渝友人寄藥，延當地醫生診治，終因醫藥罔效，雷嗣尚於一九四六年一月病逝，享年僅四十歲。

獨立撫孤守節不渝

當時抗戰雖已勝利，而雷嗣尚竟英年崩逝，文君新寡的唐舜君才卅一歲，滿懷悲愴，前途茫茫。雷嗣尚臨終時囑咐她：「舜君年華卅，青春猶在，遇有豪傑之士，幸成伴侶，但求愛護佳人，善撫子女，則所盼也。」唐舜君痛不欲生，但幼子在側，需母扶持，乃忍痛攜三子女返回北平，專心撫育子女。親友之中，不少人勸她另覓新侶，唐舜君哭著說：「婦人再醮，究非美善，何況繼父未必能善待子女？」乃持志守節，教育子女，三子女後來都受高等教育，立身社會，都是母親含辛茹苦的功勞。

當選滿族國大代表

一九四七年開始行憲，選舉行憲國大代表，唐舜君在北平當選為滿族代表，到南京開會，她的青春美貌，在會場上出盡鋒頭。而她本人能言善道，侃侃而談，對法案獻言亦多。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唐舜君攜子女隨政府來台，繼續服務國民大會。一九六〇年，第三次國大會議時，當選為主席團主席，主持議事，沉穩練達，甚獲好評。

平時，唐舜君雅愛藝事，創作不輟。抗戰期間，因戰事停筆甚久，來台後，生活逐漸安定，乃重拾畫筆，水墨濡染，元氣淋漓，深獲藝壇重視，民間爭相搜存。十二年前，曾和畫家數位聯筆作畫，贈給蔣經國祝其

當選總統，成了當時的名作。另外，唐舜君因久居北平，耳濡目染，擅長國劇，為國大劇社的名票，她擅長梅派青衣，唱腔抑揚頓錯，足可亂真，而扮像之美恐梅郎也要稍遜一籌了。唐舜君原本體力甚健，不料於一九四四年突患肺氣急喘症，治療時癒時犯，而於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年元月廿五日病逝，享年八十二歲。唐舜君生於貴顯之家，幼時錦衣玉食，及長備嘗憂患，獨力撫子育女，復能活躍玷壇，出而議政，卓著獻替，也算不虛此生。（王成聖撰）

田中角榮（一九一八—一九九三）

日本金權政治鼻祖

日本「金權政治」的鼻祖，前首相田中角榮去世已三年餘，但仍是日本政壇最受爭議的人物。

田中角榮畢生相信「金錢萬能」，他搞政治以金錢為後盾，因而自出道開始，他就努力賺錢，累積的財富價值達千億日圓以上，從政其間，他以金錢拉攏國會議員，成立了自民黨內最大的派閥「田中派」。他運用了此派的政治實力，縱橫俾圖，無往不利，在黨政兩界要求任何職位，均如探囊取物，包括自民黨幹事長，總裁及首相，無不如願以償。田中派實力巔峯時期在參眾兩院擁有議員席次達二百二十一人，故能呼風喚雨，

為所欲為。然而錢能通神，也能毀人，田中終在一九七四年捲入美商洛克希德公司五億日圓行賄案，在各方壓力下黯然下台，由三木武夫繼任首相。三木是田中在黨內的「死敵」，三木追究他的刑責，經多方調查，而於兩年後的一九七六年七月把他起訴。不過田中一直否認有罪，以致審判進行緩慢，拖了八年，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判決他入獄四年，追繳五億日圓。他又提起上訴，直到一九九三年他去逝為止，始終沒有定讞。可是「百足之虫死而未殤」，待罪期間，田中運用金錢，以「太上皇」的姿態，炮製了三任沒有田中的「田中內閣」，他們是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及竹下登，這三任首相均在他的「欽點」下走馬上任，自然以他為馬首是瞻，直到一九八五年田中角榮因中風而半身不遂，政治影響力才告衰退。然而已高舉自己大旗的竹下登，用的仍是「金權政治」的招數，等於延續了田中的政治「香火」。

初中程度榮任首相

田中角榮於一九一八年七月五日出生於新潟縣，父親是養牛的，日本媒體譽為「畜產商」，捧人而已。由於家貧，田中角榮未能好好的唸書，舊制高小畢業後來到東京，半工半讀完成中央工業學校土木科的學業（相當初中），爾後即在建築事務所、保險雜誌及貿易公司當學徒及低級職員，一九四三年二十五歲的田中創辦「田中土木建築工業

社」，由於其妻繼承娘家坂本組的產業，使他的事業蒸蒸日上，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田中的營造廠已列名於全國第五十名上下，算是大型企業了。田中角榮兩歲時曾患白喉症，幾乎丟掉小命，治癒後留下口吃的後遺症，到東京後他勤練當時正流行的歌謠「浪花節」，用以克服口吃，由於他刻苦勤練，不再不再口吃，而且朗讀速度每分鐘可達三百一十個字以上，比一般播音員還快一倍，可見他學習的毅力。

田中一派舉足輕重

大戰結束後，日本是一片廢墟，提供營造廠老板田中角榮一個大好的機會，使他大賺其錢。「錢多多」後的田中想到權勢，於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在政界元老大麻唯男鼓勵之下，以進步黨候選人資格，在新潟縣三區投身眾議員選舉，結果以第一高票落選。次年四月，日本公布戰後新憲法，重新舉行國會大選，田中再度參加角逐，卒告當選，年僅廿九歲，不久轉入自民黨，一年後以卅歲的年紀出任法務省政務次官，卅九歲任郵政大臣，四十四歲出任池田勇人第二次內閣的大藏大臣，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藏相，接著他又出任自民黨幹事長及通產大臣，多年財經要職，使他在日本產業界建立了豐厚的人脈和金脈，使他更確信「金錢就是力量」，奠下他金權政治的基礎。

田中角榮出身微寒，學歷又低，在講求

學閥和門閥的日本政壇，出頭很不容易。然而田中以廣大的金脈使自己頭角崢嶸，初期頗受不知情的日本人推崇，後來弄清他的底細，頗為人不值，晚年因受賄案身敗名裂，亦少有人同情。

和福田起夫爭第一

田中的政壇風雲以一九七二年和福田起夫爭奪自民黨總裁寶座最受矚目。戰況激烈，被當時的日本新聞界稱為「角福戰爭」，由於田中以金錢掌握黨內席次，結果使福田一敗塗地。田中膺任總裁，接著出任首相，被稱為「庶民宰相」。田中上任後立即與中共勾搭，趕在美國之前，於是年十月與中共建交。次年又和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舉行高峯會，商談歸還北方四島問題，雖未能達成收回的目的，但日本在漁業及居留方面獲得不少實益。田中在人氣鼎盛之際，發揮強力領導，提出「日本列島改造論」，強力主導土地開發，結果造成土地投機。物價狂飆，加之他的受賄案曝光，使他的「金權黑幕」表面化，不得不在一九七四年辭去首相職位，辭職後的田中滿身醜聞，被自民黨開除黨籍，聲譽跌至谷底，但田中不服氣，是年十二月，在他被判刑後，仍出面參加大選，結果以廿二萬多票當選。田中曾圖以此一成果要求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他因受賄判刑的洛克希德案，但法院沒有理會，繼續審理，直到他死去仍未定案。

畢生破了許多紀錄

田中角榮一生創下許多紀錄，卅九歲就任岸信介內閣郵政大臣，是戰後最年少閣員，這個紀錄一直到一九九二年船田元出任經企廳長官才打破。另外，他以四十四歲之年出任最重要內閣職務大藏大臣，創下歷史上最年少藏相紀錄，以五十四歲之年出任首相，創下戰後最年少首相紀錄，則至今無人能破。

田中角榮操作行政官僚的手法，也無人能望其項背。他記憶力過人，中央官廳課長級以上官員的畢業年次、生日、結婚紀念日全在他腦海裏，每逢這些重要日子都會有適當表示，因此調和鼎鼐的能力也特強。此外，他處事明快果斷，據說一天可以處理三百人和一百件陳情案，每件案子平均只要三分鐘，幾乎任何疑難雜症到他手中便可迎刃而解，連他自己也自詡是「綜合醫院」。

不過，他深信金錢萬能，一輩子官司纏身，也是歷代首相中無人能及的。一九四八年，也就是初當選眾議員的第二年，他就因收受炭礦業者一百萬圓賄賂被捕，一審判決懲役六個月，緩刑二年，二審獲判無罪。七年七月廿七日因洛克希德案被捕，八三年十月東京地院判決懲役四年，追回丸紅公司賄款五億圓，八七年東京高院二審仍維持原判，上訴最高法院纏訟至死。

日本新聞界稱田中角榮是「曠世鍊金術

大師」，估計他在東京目白台區的二千六百坪巨宅、在豐島區和文京區的不動產，以及家族企業十家公司的股份，在一九八四年地價飛騰時總資產達千億圓以上。

田中派聲勢最盛時，派下參眾兩院議員總數達一百四十人，因此他本人雖下台，往後的大平正芳、鈴木善幸和中曾根康弘都是在他支持下才能順利組閣。這時候的田中角榮稱「閣將軍」，目白台寓所稱「御殿」，他自己也曾豪氣干雲地說，細數當今天下，不受他支配的只有孫兒輩。詎料八五年竹下登自組「創政會」，田中派分裂，田中角榮一氣之下腦中風，八七年竹下派正式開張，兩年後的八九年十月田中角榮宣布退出政壇。田中的去世，種下自民黨分裂的因子。然而他的獨生女兒田中真紀子卻在一九九三年首度當選眾議員。他的女婿田中直紀也三度當選眾議員，真紀子在日本政壇十分活躍，為自民黨的女強人。看來田中的政治影響力還有繼續發揮的餘地。(劉先軍撰)

游彌堅

(一八九七—一九七二)

幼年拒受奴化教育

游柏，字彌堅，因奔走國事，乃以字行。一八九七年前十五年即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農曆九月二十六日，生於臺北市內湖鄉。先世業農，自福建詔安遷居來臺灣。

。父親游頤康，母親林女士，忠厚勤儉，薄有田產，躬耕自足，對國家民族觀念極強。游氏生當日本侵佔臺灣之第三年，是時日本推行奴化教育政策，在國民學校免費普授日文。

游氏在昆仲三人中居長，天賦穎慧過人，得父親鍾愛，拒入日校，進私塾，讀三字經、百家姓，均能過目成誦，讀書之餘，遵庭訓勤習農耕，繼承祖業，祖父游紅寬見游氏岐嶷誠篤，深堪造就，特為延聘塾師至家中，授子四書；復命他從母舅林雲龍讀經史。十三歲進入松山國民學校，以成績優異，跳級升班，十七歲畢業。眼見臺胞在日人統治之下，備受凌辱，民族意識與年俱增，堅信良師足以興國，須藉教育文化一端，始能光復臺灣，遂決定從事教育工作，啟迪民智，喚起臺胞，團結抗日，乃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即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前身)。日人對臺灣青年人才之發展，箝制特嚴，捨教育及醫藥外，其他學科皆不得肄習。日籍校長為炫示大和民族之優秀，對日籍學生每試多獲加分，使名列前茅，以矜憐凌轍。

惟游氏所學各科，成績迥異，恒占鰲頭，於民國七年畢業時，破例以第一名列榜首。日人莫不為之震駭氣奪，臺灣青年則大為吐氣揚眉，游氏聲名遂益噪於士林。

師範畢業後，分發在臺北市老松國校執教兩年，請准調返母校松山國校服務又三年

。因刻苦負責，勤慎教學，調升總督府成德學院教諭。成德學院是一所專收問題學生之學校，學生年齡較大，最難管教。經濟心研究後，決定變更教導方式，以音樂遊戲為主，以旅行寫生為輔，使學生忘懷過去，改變惡劣習慣。潛移默化，循循善誘，親切體貼，學生於是多能敦品力學，向上成才。

負笈東瀛專攻經濟

游氏閱世既多，感受亡國之恨亦與日俱積，無時無刻不以驅逐日寇，光復臺灣為念。每利用教學機會，鼓吹民族氣節，激勵學生愛國情緒，復決心繼續深造，充實自己，伺機投奔祖國，結合革命力量，謀求規復版圖。平日精勤自修華語、英語，薪資所得，節食儉用，力求積蓄，卒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春負笈東瀛，入日本大學專攻經濟。一九二七年畢業返臺後，即隻身潛赴北平，為避日本特務耳目，不用「游柏」原名，改以字行，並恢復福建詔安祖籍，與家人音問斷絕，使日諜莫知踪跡，以免株連，洵見志士之用心良苦。

游彌堅初抵祖國，人地生疏，舉目無親，先受雇於一印刷所，得與時賢學者結識，民國十八年，乃得推介赴南京任三民中學英文教員。偶識名軍事學家蔣百里（方震），與百里接膝傾談。蔣百里驚其學識淵博，見解敏銳，大加激賞，遂將所著中外文稿，託付校訂整理，並吸引加入中國國民黨，推介

入中央軍官學校任少校政治教官。

江蘇無錫望族之王廣（受慶）將軍，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乃文武兼資之奇才，少年騰達，有名於時，與蔣百里氏交稱莫逆。知王氏胞妹淑敏女士畢業北京女師大附中後，尚待字閨中，乃極言游氏之賢能，他日必為國家大用，褒美揄揚，熱心從中撮合，襄修之任，輒告成功。民國二十年，游氏與王女士結婚於南京。是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閥突佔東北三省，國際聯盟組中國東北事件調查團，派英人李頓爵士任團長，率團來華調查。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博士，物色幹練而精於中、英、日三國語文，且熟諳日本政情者為秘書，以游彌堅為最適當之人選。經王廣將軍推薦後，極得顧維鈞博士之信任。游氏掌握此一珍奇報國機會，乃多方搜集有關日本侵華事實證據，提供最有利中國之有力資料，隨顧維鈞赴瑞士日內瓦參加國際會議，卒使李頓報告書同情中國。故國際聯盟之譴責日本為侵略者，出於游氏之贊襄籌策者甚多。

國聯會議事畢，仍隨顧維鈞留巴黎為駐法使館秘書，並在巴黎大學深造。至二十二年歸國，就任財政部稅警總團軍需處長，當時稅警團採最新精銳軍旅之裝備，為中國機械化部隊之模範。一九三四年冬，改任兵工署應用化學研究所總務科長。一九三五年改任湖南省財政廳視察，兼任湖南大學教授。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軍興，出任邵陽（寶慶）稅務局長，（當時湖南省依行政區設稅

務局八局）。銳意革新稅政，不顧地方惡勢力之阻撓與威脅，斷然取消包徵制度，實施直接稽徵。在職一年，稅收倍增，極為廳長尹任先所贊賞，乃被邀回財政廳任第一科科长，凡事多先諮詢。

抗戰第二年，日本軍閥派機施行濫炸，湖南省政府決遷湘西沅陵，廳長及各科室員工均已首途，獨第一科因幾十年累存之稅照糧單檔案特多，堆積盈屋待船疏運。游氏不待請示，當機立斷，除保留底冊外，其餘全部付之一炬，大膽施為，左右均為之震驚。事後廳長獲知，深許其有決斷擔當，從而節省不少搬運、倉儲及保管之費用。

一九三九年，辭科長職，赴仰光經營汽車貿易，往返緬甸、香港間，實則為政府搶購軍事武器，兼辦茶葉皮革等貨物之出口。事因當時廣州已淪陷，中國海岸被日寇全線封鎖，進出口貨物，均須由昆明滇緬公路至仰光，始克連接海運。

台澎光復主持財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後，大舉南下，席捲南太平洋各島嶼及東南亞各國殖民地，香港於耶誕節亦告淪陷。時游氏適過香港，為掩護中國留港黨政工作人員及眷屬內渡，被日軍所執，受刑創傷。脫險後，間關奔重慶，臂指均受傷，療治經年始愈。而黨政工作人員因以存活在港者甚多，事蹟數見於名達筆記，游氏未嘗一言自詡功績。

一九四三年初，受任財政部花紗布管制局總務處長兼視察室主任，及總電臺臺長，一身膺三要職，受倚重可知。一九四四年，國軍節節轉進，鄂南湘北各濱湖產棉地區，次第淪入敵手，後方軍需民用棉花奇缺，計惟向陷區搶購。乃奉命游氏為鄂中辦事處處長，於三斗坪及萬縣，分別設立收購接運機關。嘗率幹部喬裝深入敵後，激勵棉農內運，期年即獲二十萬擔，軍需民用以紓，迭獲財政部令嘉獎記功。是年五月，中央設計局下設臺灣設計委員會，游氏乃臺灣革命同志會之常務委員，對規復臺灣研擬接收重建計劃，活動甚力，極為政府所重視，當即奉聘為委員，多所獻策建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寇敗降，中國抗戰勝利，臺澎光復，奉命任財政部特派員，返臺主持財政金融機構之接收事宜。親友聞訊，結綵演劇，聚迎於基隆者數千人，情緒之真摯熱烈，實屬空前。當游氏瞥見雙親仍然健在，且在人潮擁擠之中，急奔趨雙親面前，長跪膝下，久久不能發一語。蓋因國事睽離鄉井十八年來，朝思暮想，心有千千結，更深深體會故鄉父老對他的厚愛與期許。

忠貞練達造福鄉邦

游氏接收省金融事宜，井然有條，凡事靡不鈞稽明析。迨任務告竣，即接任臺北市長，並兼省府委員。當時台北市內以兵燹痕跡猶新，到處殘垣斷瓦，垃圾堆積逾三百

萬噸，各校門窗幾無一片完整，工商蕭條，稅源枯竭，失業失學，百廢待舉。游氏勞來安撫，苦心籌措，不數月市政漸入常軌，乃以接收土地，獎勵投資，興建房屋，振興百業，繁榮經濟，民力充裕，歷四載去職，臺北市曾有模範市之美稱。

游氏原習師範，故於從政從商外，對教育建設亦是不遺餘力。在臺北市長任內，雖極忙碌，仍撥冗兼任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淡江中學董事長兼校長、第一屆教育會理事長。復捐廉倡辦教員互助福利會、會員自由參加，月納會金二元，凡遇疾病喪葬及子女升學者，均得補助。且於省市設教師招待所，教員差旅食宿稱便。以建會基金運用學息，積儲達數百萬元，編印注音國語文教學法，教師手冊，及美術、音樂、勞作、習字等科課本送部審定後發行。教學困難遂以解除，教師生活得以提高，游氏深得全國教育界之推許愛戴。一九四七年選舉國民大會代表，竟能不費分文從事競選，終以得極高票當選。且由於互助辦法之推行著效，教育部通令全國風行，即以政府所舉辦公務人員及勞工保險，亦皆仿效於此得以大為推廣。一九四四年赴歐美考察教育歸來，寫成報告，即為文力倡延長義務教育及提高師範生修業年限，數年後卒獲實現。

游氏於公私職事，必恭必謹，恆昧旦而出，至深夜始歸。家人婉勸節勞，他慨然曰：「我詎不自卹其身耶？第以受國家培植之恩，鄉黨昂望之切，父老基隆聚迎厚愛，固

刻刻在念，敢不勉圖有所報稱？你們要長記在心，奉職赴事必應如是」。自一九四〇年堅辭台北市長職務後，即致力文化及社會工作，歷任行政院設計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設計委員，臺灣紙業公司、泰安保險公司、國語日報、仁濟救濟院等董事長，世界紅十字會臺灣分會會長、扶輪社臺灣區總監督，暨觀光事業協會會長等職。嘗代表我國出席聯合國文教科會議，及國際勞工會議，生平出國數十次，足跡遍世界五大洲，見聞至廣。以為發展觀光事業，足以宣傳國策，加強國民外交，促進國際貿易，爭取外匯，宣揚中國文化，鞏固世界民主反共精神堡壘，實為當務之急，乃更儘力策劃推動。今日觀光事業之得以蓬勃發展，舉世為之矚目，游氏倡導創始之功，永不可沒。

游氏忠貞練達，在官在野，均以造福鄉邦，愛護政府，光大憲政建設。矢勇矢勤，在艱彌厲，其愛護國家，造福全民之志業，一如當年奔走大陸翹望臺灣之光復者然，功業蒼生，老而益壯。不幸於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因心肌梗塞逝世於臺北寓所，享壽七十有五歲，卜葬陽明山第一公墓。公子四人：除長子並茂，侍居臺灣外，餘均留美國。次子敬熙加州大學博士，執教於美國德州大學；三子宗熙，加州大學碩士，供職於美國鋼鐵公司；四子復熙，美卡尼基理工學院博士，加州理工學院超博士研究，任教於英國劍橋大學。一門俊彥，各有樹立。（黃金文撰。參考國大代表傳略）